

## 先天下之忧：论何国忠“学院派散文”的忧患意识

纪学玲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摘要：**何国忠不仅是一名学者，更是 80 年代马华学院派校园散文的重要奠基者，其散文创作深刻反映了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本文以他创作并出版于马大求学及执教期间的校园散文三部曲《班苔谷灯影》《塔里塔外》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为脉络，通过文本细读与历时性考察，重构何国忠从青年学子到人文学者的心灵成长史。何国忠的“忧患意识”不仅体现为对华社命运的感时忧国，更在感物吟志中展露理想主义者的敏感，并升华为学者身份下对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其不渲不染的忧患叙述风格，恰是知识分子性格中理性与克制的写照。本文试图以“忧患意识”为纲领，完整勾勒何国忠兼具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性格特质。

**关键词：**何国忠；学院派散文；忧患意识；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

### 前言

何国忠（1963-）是马华文坛少数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他于 1984 年入读马大中文系后便投身学生运动、撰写社论，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大学时代即在马华文坛崭露头角。他与叶宁（本名庄丽暄，1959-）、瘦子（本名许友彬，1955-）、潘碧华（1965-）等大专校园作家的散文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马华散文创作中曾各领一时风骚。何国忠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完成学士与硕士学位，后取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学位，曾任马来亚大学讲师、副教授、东亚研究系主任及中国研究所首任所长。2008 年，他毅然从政，曾官拜高等教育部第一副部长。随后虽渐淡出政坛，但一直活跃于学术与写作圈子。身兼文人、学者与政治人物的多重身份，使他和他的作品对社会现实与文化遗产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其创作与思想也深刻体现了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

作为 80 年代马华校园散文学院派的重要奠基者，何国忠以深沉独特的忧患意识书写时代，与古今忧患传统一脉相承又别具一格。他的校园散文三部曲《班苔谷灯影》（1989）《塔里塔外》（1995）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皆创作于其就读和执教马来亚大学期间。这些作品以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理性思辨的笔触，呈现了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马来西亚社会的现实图景，折射

出马来西亚华裔族群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也深刻体现了何国忠马华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社会苦难的敏锐感知、对族群前途的忧思，逐步转向对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的终极关怀。这种意识既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情怀，更在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语境下生长出对人文价值的超越性关怀。这种时代担当，使他的散文奠定了学院派校园散文在马华文学史上的地位，构筑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散文书写的独特风景。

本文以“忧患意识”为纲领，通过对上述三部散文的文本细读与历时性考察，分析何国忠忧患意识的三个维度——“感时忧国”的公共介入、“感物吟志”的个体省思、“人间情怀”的文化超越，探讨其如何将现实困境的敏锐感受转化为对人文精神的深层关怀，从而实现“先天下之忧”传统精神在当代语境下的实践，并勾勒何国忠兼具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性格特质。

## 一、忧患书写的开端：何国忠与学院派散文的奠基

### （一）校园散文的兴起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初，马来西亚高校兴起了一股校园文学热潮，一批以马来亚大学和理工大学为代表的大学生写手崭露头角。他们组建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创办文学奖项，校园文学创作蓬勃发展，题材多样，其中尤以散文创作最为引人注目。在那个年代，马来西亚的大学屈指可数，能考入大学的学生皆为出类拔萃的“天子骄子”。这些学子用以抒情纪事的散文，在马华文学史上被定位为“校园散文”<sup>1</sup>。叶宁的《飞跃马大校园》（1982）开启了校园散文的序幕，瘦子的《大学生手记》（1983年）亦是这一潮流的早期代表，他们以或浪漫唯美或幽默活泼的手法构建了令人向往的“马大神话”。陈大为（2009）将这类散文定义为“校园生活散文”<sup>2</sup>，其特点在于轻松易读、富有生活情趣，深受当时读者欢迎。继叶宁、瘦子之后，“读中文系的小子”何国忠亦创作了不少校园作品，然而其散文风格却与前辈的轻松叙事截然不同。

何国忠的大学时代属马来西亚华社的多事之秋。他的校园散文三部曲皆出版于马哈迪第一次任相（1982-2003）的“马哈迪时代”。马哈迪的施政深刻影响了华裔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发展。自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族裔矛盾始终暗流涌动，其中华裔族群对语言、教育和文化自主性的追求成为争议焦点。1980至1990年代，马来西亚自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转型，中产阶级崛起，然而，政治领域却仍被种族问题的阴影笼罩。马哈迪延续前任的“新经济政策”，通过固打制强势扶持土著，在企业所有权和大学录取等方面对华裔族群形成压制。此外，华文招牌、华小高职不谙中文事件，茅草行动等政策偏差，以及对华教行政的频繁干预，进一步加剧华裔族群的边缘化危机。华社面临的多重结构性困境让身处象牙塔的华裔学子亦无

<sup>1</sup> 钟怡雯：〈马华校园散文的文学史意义〉，《灵魂的经纬度：马华散文的玉林和心灵图景》，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页62-97；陈大为：〈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之完成（1979-1994）〉，《马华散文史纵论（1957-2007）》，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185-222；黄锦树：〈在马哈迪时代抒情〉，《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页133。

<sup>2</sup> 陈大为：〈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之完成（1979-1994）〉，《马华散文史纵论（1957-2007）》，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185-222

法置身事外，深受这一氛围感染。何国忠作为中文系学生，在这一风雨飘摇的年代，显然无法如叶宁或瘦子那样以轻松惬意的笔调构筑象牙塔内的乌托邦。他的目光透过校园的围墙，投射更广阔的社会天地，聚焦于国家时局、族群命运与文化思考。他的散文叙事中处处可见这一代华裔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潜在危机的警觉以及舍我其谁的担当。作为怀抱理想、肩负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何国忠无法对族群的前途和文化的命运无动于衷，他的校园散文自然而然地笼罩着沉郁深沉的忧患基调。

## （二）忧患意识与先天下之忧的时代内涵

近代学者徐复观在《中华人性论史》（1969）中指出：“忧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sup>3</sup> 这一观点强调了忧患意识与责任感、自觉意识的内在关联。换言之，忧患意识并非单纯情感上的忧虑或悲观情绪，而是一种对潜在危机的自觉感知与担当，以及敏锐洞察和前瞻性思考衍生而来的“先天下之忧”<sup>4</sup>。何国忠深受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熏陶，显然继承了这一精神薪火。但他并非只是因袭前人理念，而是结合身处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现实，将传统的忧患意识转化出新的时代内涵，融入 80 年代华裔知识分子的行动与思考。他既继承了传统文人的经世情怀，又受社会现实刺激而展现出多重使命意识：既要守护族群权益，也要在学术与人文精神层面追求更高的价值理想。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家国命运与华裔困境的叹惋，更内含一种理想主义的敏感——何国忠在作品里屡次流露出对人文理想的渴求，对学术文化使命的坚守，这也使得他的散文不至于陷入单纯的悲情，而是兼具理性与克制。一方面，他在作品中秉承了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以理性克制的写作策略来表达情怀，将深沉的忧思融汇进冷静客观的叙述之中，而非简单的情绪宣泄。这种“不渲不染”的理性笔调，使其忧患书写别具一格：既有力度和深度，又不失节制和从容。何国忠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校园散文的主题层次从单纯的生活抒写提升到关照时代、反思文化的高度。

## （三）学院派散文的忧患表达与文学史定位

校园散文三部曲贯穿了何国忠在马来亚大学的求学与任教生涯，是其忧患意识逐步深化的重要载体。《班荇谷灯影》（1989）以青年学子“不平则鸣”精神开启了“学院派”文化书写的角度。钟怡雯、陈大为（2007）认为该书是“校园散文从轻转重的里程碑”<sup>5</sup>，标志着散文从生活记录转向知识分子表达忧思的新境域。《塔里塔外》（1995）则将视野从校园扩展到社会文化批评，强调理性批判与文化深度并重，渐次奠定学院派校园散文的思想基调。至《文化人的感情

<sup>3</sup>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sup>4</sup> 注释：“先天下之忧”一语源自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代文人素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稷安危与黎民疾苦，这种先忧后乐的情怀成为传统华人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sup>5</sup> 钟怡雯、陈大为：《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 VOL. 2》，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页137。

世界》(2002)，何国忠以怀人散文探讨跨域文化人的生命轨迹与精神困境，凸显对人文价值的深切关注，并展现对社会与历史更宽广的关注面向。在三部曲的互文对照下，我们可看见何国忠从公共介入到个体省思，最终升华为更宏观的文化超越，完整勾勒出其从青年学子到人文学者的心灵成长史。学者郑明娟(2016)指出，《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可被视为“典型的学者散文”<sup>6</sup>，而陈大为(2009)更认为该书可视为“校园散文最成熟的演进类型之一”<sup>7</sup>。学院派散文与学者散文在现代散文研究中概念往往交错。例如香港沙田派散文既被称为“学院派作家散文”，也常被视作“学者散文”。两者皆为人文知识分子创作、具有学者专业个性、文化立场与话语方式的散文作品。本文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探讨时交互并用，并以陈大为对“学院派校园散文”的界定为参照，以突显何国忠散文既脱胎自马华文学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校园散文风潮，又因学术特质而与一般校园散文有所区别。

在校园散文的发展历程中，何国忠以“忧患意识”将散文创作从记录生活或自娱娱人的范围提升到关照现实、介入时代的层次。他虽身处校园，却不断放眼社会，与那个时代同频共振。学院派校园散文由何国忠的校园散文三部曲掀开帷幕，奠定基础，趋向成熟。其中，何国忠散文中的忧患意识，被讨论得最多的往往是他的“家国忧思”；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语境中，学者也多以“感时忧国”作为80-90年代校园散文忧患意识的注脚。笔者却以为，何国忠校园散文的忧患内涵从对族群困境出发，逐步扩展到文化续存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超越了传统的“家国忧思”，展现了更广泛的人文视野与文化共情。

## 二、忧患意识的三重维度：从家国到人文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种深沉的思想表达，体现了何国忠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这种意识根植于他对马来西亚华社现实困境的敏锐感知，贯穿于他对个体精神追求的反思，最终升华为对人性与文化价值的终极关怀。既有对何国忠忧患意识的研究多聚焦于“家国忧思”，强调其在马来西亚华社抗争语境下的现实介入。然而，若仅以“感时忧国”概括其散文精神，则可能遮蔽了其忧患书写更深层次的复杂性与超越性。通过对何国忠校园散文三部曲《班荇谷灯影》《塔里塔外》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的细读，不难发现其忧患意识的三重维度：关注社会现实的“感时忧国”、反思个体志向的“感物吟志”以及超越族群叙事的“人间情怀”。这三个维度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并且相互关联，共同勾勒出何国忠从青年学子到成熟学者的心灵成长轨迹，构筑了其散文的思想内核，同时展现其从家国忧思到人文关怀的思想演进，使其“学院派散文”既富有时代担当，也体现出深刻的人文反思。换言之，何国忠不仅忧虑华社之“天下”，更着眼于当代知识分子如何传承并实践“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使命。本章以此为脉络，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何国忠如何以散文为媒介，将对族群危机的忧虑转化为对人文价值的终极追问。其忧患意识并非静态的“抗争工具”，

<sup>6</sup> 郑明娟：〈论何国忠散文〉，《香港文学》，2016年3月，第375期。

<sup>7</sup> 陈大为：〈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之完成（1979-1994）〉，《马华散文史纵论（1957-2007）》，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185-222。

而是动态的“思想实验”——从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剖析，到人文理想的孤独坚守，最终升华为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普遍共情。这一过程既彰显了何国忠作为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双重特质，也为马华文学提供了一条超越族群叙事的可能路径。

### （一）感时忧国：华社困境的镜像书写

在《班荇谷灯影》再版的〈十方版自序〉（1995）<sup>8</sup>，何国忠这样回顾自己的早期创作：

“我摩挲故作，知道自己从前感情充沛，仿佛又有些忧患意识，有许多不满，许多不  
自在，也有点理想，但思想和知识的体验，还有许多可以成长的空间。”<sup>9</sup>

这一自述不仅是作者的自我意识的写照，也折射了 80 年代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的复杂情感与时代忧思。文学创作并非孤立的思想表达，其生成与社会现实及文化语境有着深刻的互动关联。何国忠的散文亦然，他青年时期的忧患意识深深根植于马来西亚华社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他的第一部校园散文《班荇谷灯影》（1989）记录了他在马来亚大学求学、任助教、做硕士研究期间的经历与思考。马来亚大学位于班荇谷（Lembah Pantai），班荇谷的灯影投射出的正是他对现实社会的有感而发，蕴含年轻学子的理想与热忱。

20 世纪 80 年代马来西亚在马哈迪主政下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延续“新经济政策”和固打制，旨在提升土著地位，却对华裔族群在教育、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展构成显著制约，大学录取名额的种族配额限制了华裔青年的升学机会，而对华文教育和文化的干预则加剧了族群的文化危机感。华社内忧外患交织，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处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何国忠，自然对华社的现实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他的作品正是记录与反思这一时代华裔青年共同困境的重要文本。在论文〈忧患意识中的文化情怀〉（1989），他生动刻画了当时华裔大学生在文化危机下的自觉与抗争：

马大中文系在七十年代末人数激增；国民大学华族学生从 1983 年开始每年都办大型的中秋文娱晚会；而马大、理大华文学会的文化活动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危机感最强烈的时期，其凝聚力更是其他学会望尘莫及的。国内其他大学虽然不允许华文学会存在，但大学生却能在所及的范围内主办与中华文化有关的活动、出版刊物，不眠不休，这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文化使命在大专学府可说是代表了这一代青年的“忧患意识”。<sup>10</sup>

<sup>8</sup> 注释：《班荇谷灯影》是何国忠的第一部散文集，1989 年由泽吟书坊出版，后由十方出版社于 1995 年再版。

<sup>9</sup> 何国忠：〈十方版自序〉，《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页 5。

<sup>10</sup> 何国忠：〈寻找自己的身份：忧患意识中的文化情怀〉，《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研出版社，2002 年，页 219-220。

大学校园虽被视为“象牙塔”，却也无法脱离社会政治氛围。外部政策压力与现实挫折令人深感无力，也激发了大学生内在的文化使命感与忧虑情绪。〈时代的眼睛〉(1989)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

十多二十年来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节节败退，华人的心理普遍上都存在着非常强烈的挫折感。大学生也看书读报，对于外面的事不可能说是毫无知觉的。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自然也很了解人民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希望和痛苦。我们常说大学是社会的缩影，这一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事，里面几乎都发生着。外面有行政偏差的事件，里头一样不能幸免；外边有种族极化的现象，里头照样不能避开。因此华社中一切的不如意事，大学生是很能心领神会的。<sup>11</sup>

透过校园这一社会的缩影，他清晰地捕捉到了华裔青年面对时代困境的焦虑与不安。〈时代的眼睛〉写于何国忠在马大的第四年，这时的他已从积极争取成立马大华文学会的热血执委功成身退，更喜欢躲在图书馆里进行思考和探索。华社处境窘迫，象牙塔里的华裔学子也无法幸免于固打制、大专法令、行政偏差、种族两极化等困境中，对华裔大学生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身处中文系的何国忠感受自然更加深刻。正如身在海外却一直关注马来西亚国情的学者黄锦树所指，由于教育政策的影响，能挤进马大窄门的华裔学子不仅是华社的天之骄子，更是处于文化冲突的最前线，因此诞生于这个年代的校园散文往往带有“超额的忧患感”<sup>12</sup>。这种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高度融合，作为一个有理想又富有文化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何国忠无法不对族群的未来与文化的命运感到忧虑。在同一篇散文中，何国忠忍不住省思：“这一代的华裔大学生是否会成为将来族群中的眼睛呢？”他担忧时局压力可能导致大学生“在既急迫又束手无策的不健康心理下成长”<sup>13</sup>，从而视野狭窄、思想贫乏。由此引发的，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与反省：大学生是否能成为族群的‘眼睛’，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保持洞察与担当？

在〈残存记忆中的腾跃〉(1989)一文中，何国忠回忆了参与华文学会筹委会争取成立华文学会到见证其成立的全过程，体现了个人与集体命运的交织：

在筹委会的生涯里，所感受的快乐和忧伤，一万字岁未言短，十万字，甚至是百万字又何能尽意？我的大学生活假如没有华文学会筹委会的点缀，肯定是空白无味的一章。那两年，让我长大，在因循错误交织的华裔社会里，肯定了自己所扮演的角

---

<sup>11</sup> 何国忠：〈时代的眼光〉，《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04-112。

<sup>12</sup> 黄锦树：〈在马哈迪时代抒情〉，《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133。

<sup>13</sup> 同注释14。

色。<sup>14</sup>

这一平实却带有沉思意味的笔调，揭示了他对现实困境的冷静反思和自我成长历程。筹委会的工作占据了何国忠大学生涯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虽然繁重且充满不确定性，但他仍愿意将个人成长与集体命运紧密联系。在华文学会被正式宣布成立以前，筹委会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向大众公布，面对一波三折的官方审批过程，此前“狼来了”的经历使早熟的学子们有了戒心，担心“过早的兴奋将会带来长久的失望和伤感”<sup>15</sup>，但他们也在辛劳与等待中获得成长。华文学会在华裔大学生不屈不挠地抗争了12年之后，1986年底终于在马大校长宣布下正式成立：

当时许多学生都逃课赶往现场，这一回肯定是真的了。没有一个学生不百感交集，

静静地想一想，心里总还是有一丝丝的不甘心，为什么要等十二年那么久呢？……

在华文学会筹委会里头活动过的人，谁不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sup>16</sup>

族群与文化的权益一直是华社悲愤的因子，然而这段文字既无慷慨激昂的控诉，亦无沉溺式的感伤，何国忠摒弃悲情渲染，通过冷静克制的叙述和反问，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揭示华社争取权益之路的艰辛，也暗含对未来的忧思。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又以议论的方式剖析华社对大学生的忽视：

华裔社会人士一向来只关注大专学府学额的争取，对于大学里所发生的一切事物，

从来不曾主动关心过，总以为能进大学的华裔子弟都是天子骄子。将他们送到里面，

他们就一个个心满意足了。殊不知大学对社会思潮有着带头的作用，是培养国家民

族领袖的最佳场所。而华文学会的成立，更能在训练华裔社会领袖方面起着推波助

澜的作用。<sup>17</sup>

除了批判华社人士伪善面孔背后的短视与功利，何国忠也对当时一些华裔领袖的无作为提出长叹式省思：

华裔所面对的难题堆积如山，华裔头头缺乏他们应有的权威性……和这些人交谈以

后，当然更能进一步知道华裔地位低落的由来，以及华族难题发生的必然性。……总

括一句，官官不是不为，事实是有心无力。”<sup>18</sup>

<sup>14</sup> 何国忠：〈残存记忆中的腾跃〉，《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33-42。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同上。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同上。

文章不仅着力揭露外在政治环境的压制，也回望华社内在种种弊端和痼疾。华社问题积累已久，固然是有国家政策偏差而使华裔权益受侵，遭受种种不公平的缘故，可问题一直常年悬而未决，未尝与族人目光短浅，思想狭隘不无关系。这种对华社内忧的审视，在《斑苔谷灯影》的〈疏忽了的关心〉（1989）〈团结口号中的沉思〉（1989）等篇目中亦多有体现。他认为，华社未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往往只会因一时口号和表面热情而忽略了长期的思考与持续努力，结果便在恶性循环里深陷难以自拔的尴尬局面。例如，在〈疏忽了的关心〉中以一连串诘问揭露华社对大学生困境的漠视：

华裔社会的观念是：能将他们送入大学，他们应该已心满意足，是不应该有什么奢求的了。因此华裔大学生的心态如何？他们在大学如何度日？大学的制度如何？在种族的比例有差距而学生有有种族两极化的倾向时，他们如何自处？大专法令的内容是什么？学生会又是怎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当今许多政坛的顶尖领袖都是出自学生会？一大堆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但是大部分的华裔社会人士都回答不出，事实上他们似乎也不想去回答。<sup>19</sup>

他犀利地质问华裔社会人士何曾关心过学子如何自处？大专法令如何钳制思想？这种批判既指向外部环境对人文教育的压制，亦暗含对族群短视的痛心。在〈团结口号中的沉思〉中，他以理性笔调批判华社口号的空洞化：

我们一直被权益问题干扰了视线，结果许多迫切需要我们努力的事情都在无意中被疏忽掉了。事实上，如果连民族尊严也没有的话，再多喊几声团结口号也是徒然。<sup>20</sup>

当现实中的“权益”争取不断干扰华社的视线，真正需要反思和努力的文化、思想、教育等更根本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华社缺乏对于大学制度的真正关注，也无力给予作为族群未来希望的大学生人文学术上的支持，终至让年轻一代陷于“道远而力微”的失落与疲惫。

华社的“外部困境”与“内部弊端”被何国忠一并纳入笔下，进行多层次的批判与自省。他多次指出，当华社人士只把目光聚焦于“争取更多学额”或表面功利，而忽视大学生的人文培养与学术环境时，就很难谈及长远的文化根基与民族尊严。这些文字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理性批判，勾勒出华社目光狭隘与伪善的沉疴，凸显何国忠对族群未来的深沉忧虑。他认为，真正的忧患根源不仅在于外部压迫，更在于内部对人文学术思想的忽视和精神层面的贫乏。何国忠的这种“感时忧国”不仅是直面社会现实的困顿，也隐含对内在反思、文化素养与精神格局的忧虑，对未来走向与文化理想的追问。

<sup>19</sup> 何国忠：〈疏忽了的关心〉，《班苔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50-52。

<sup>20</sup> 何国忠：〈团结口号中的沉思〉，《班苔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65-67。

对华社问题的镜像式书写，不仅再现了马华社会现实的深刻困境，彰显了知识分子对族群未来的深沉忧虑与责任担当，也是何国忠作为当代华裔知识分子呼应“先天下之忧”的直接实践。然而，这种忧患意识并非停留于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回应，而是逐步深入到对个体精神困境与人文价值的反思，从而构成他忧患书写的另一层维度——“感物吟志”。

## （二）感物吟志：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困境

对于何国忠而言，忧患意识不仅体现在对家国大事的关注，也渗透在他个人志业的选择与生命体验之中。如果说“感时忧国”主要聚焦华社公共层面的危机，那么“感物吟志”则转向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层焦虑，进一步体现了何国忠作为理想主义者与学者型散文家的自我期许与困境。此时的忧思，不再单纯指向对族群命运的忧虑，也包含对自身学术道路、文化价值乃至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持续反省。何国忠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张力中，从早期的家国叙事过渡到更具人文自省的写作。在其散文中，多以平实却饱含思辨的笔调勾勒出这一层精神矛盾——既不舍对社会的现实担当，又困于个体学术与文化理想的挣扎，并逐渐内化为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思考。

何国忠立志很早。他很早就决心要修读人文学科，且在高中时期就已决定了将来要走学术的路。他在代表作〈读中文系的小子〉（1989）以第三人称写了这样一段告白：

他景仰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修读人文学科的，而探讨人性本质又是他最大的兴趣，

当初他是凭着兴趣进入文学院，最后仍然以同样的理由选择中文系，他有一个信念，

只要念得好，他一样能扬眉吐气！<sup>21</sup>

他将自己“探讨人性本质”的志趣发展为“修读人文学科”的志向，并义无反顾地朝着“学术的路”勇往直前。然而，正因为这种近乎执拗的信念，让何国忠在这个对人文学科并不友善的功利社会，以及在自身族群处境并不乐观的时代和政治环境中，无可避免地与忧患意识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他修读的还是肩负文化重担却又被认为出路狭窄的中文系！在〈读中文系的小子〉这篇散文中，何国忠细腻地剖析了自己作为中文系学生的心路历程：既要承载华社对文化传承的期待，又需直面经济压力与学术边缘化的现实。这种状态使其忧患意识从族群层面转向个体精神层面：作为一位承担社会责任的文人学者，究竟如何平衡“人文理想”与“生存现实”？这也正是何国忠“感物吟志”的重要起点。

“感物吟志”典出刘勰（约465-520）《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sup>22</sup> 意指文人触景生情，以外物寄托志向情怀。“感物”不仅指对外部世界的敏锐感受，也往往蕴含对社会人生的移情与思辨；“吟志”则是抒发自身志向、抱负与道德情怀。何国忠承继这一传统文人写作观，却又将其扩充到马来西亚当代脉络中。身处多元文化环境，

<sup>21</sup> 何国忠：〈读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26-32。

<sup>22</sup>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56。

中文系学生和华裔学者的身份，使何国忠在日常所见所闻中激发出对民族文化与人文学术的强烈执着。然而，在工商挂帅的马来西亚，念中文系、坚持做学术研究都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于是，那种价值观和志向不被主流社会认同，持久沉重的忧患矛盾便时时在何国忠感物吟志的散文创作中流露。

年轻的何国忠曾观察到：“大半早熟又有理想的年轻人的成长过程都是在忧患、挫折、不满、迷茫中交集而成。”<sup>23</sup> 他本身就有着早熟又有理想的年轻人的敏感触觉，所以他的忧患意识觉醒展现得极早。高中立下志愿之后，因担心应酬会耽搁学术，他很少主动结交新朋友。当时的他甚至以为孤独更能激励创作，所以为自己筑起了一道墙。那时的他极崇拜胡适（1891-1962），为了学胡适的老成持重，他极力压抑自己的个性。他在〈消逝了的似青山还在〉（1989）提到：

胡适的做人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甚至将他当作我人生的典范。胡适的老成持重

是出了名的，为了学他，我只好压抑自己的个性，不爱言笑，每天装着老成持重成

熟的样子，做个不像大人的大人。<sup>24</sup>

为了自己的志向和景仰的人物，他把自己原来“说话特别多，笑也特别多，整天蹦蹦跳跳，兴起时还会哼几首歌曲”<sup>25</sup> 的性子往老成持重压抑，尽管后来他改变了这样的想法，不再压抑自己的性格，老成持重最后却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沉静凝练的文风。综观何国忠的校园散文三部曲，只有发表于大学一年级的〈消逝了的似青山还在〉的基调是愉悦而外放的。这篇散文抒写了他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前，在某个小镇当临时教师的一段愉快的生活。正是这个令他怀念不已的小镇改变了他想要变得孤单的想法。此文在谈起自己的志向之时，尚能感受到其笔触间一种调皮的自我调侃。然而，随着大学生涯的开展，他的校园环境、他的志向、他的使命感让他再也逃不开文化的承担，自此以后，诉诸散文创作之中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展颜欢笑”<sup>26</sup> 那种化不开的忧患情怀。

同样在马大校园里，何国忠的象牙塔没有叶宁的豪爽潇洒、神采飞扬，也没有瘦子的活泼诙谐，因为他是柏杨口中“走路时，头总是低低的”<sup>27</sup>的中文系学生。尽管他选修中文系的决心是坚定的，当一再面对“不该问的问题”，或者被关心地询问：“选修中文系时，家里是否有人反对？”<sup>28</sup> 时，他虽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回应，却无法波澜不惊，因而散文中屡屡流露身份焦虑。“他自始至终都知道，文学院的录取分数是各个学院最低的……而中文系又曾被人说是文学

<sup>23</sup> 何国忠：〈论大学生的思想困境〉《今我来思》，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3，页 33。

<sup>24</sup> 何国忠：〈消逝了的似青山还在〉，《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页 12-18。

<sup>25</sup> 同上

<sup>26</sup> 何国忠：〈苦涩的岁月〉《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页 62-64。

<sup>27</sup> 何国忠：〈读中文系的小子〉，《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 年，页 26-32。

<sup>28</sup> 同上

院中出路最狭窄的——”<sup>29</sup> 尽管习以为常，他还是常会忍不住去思考这些问题。他在文章中坦言，中文系学生往往比其他科系的学生更容易产生忧患心理，因为他们过早地承受了社会对他们的异样眼光，以及对于未来的忧虑。而拥有典型传统文人气质和性情的何国忠对这一种意识更加敏感。社会的趋势是注重工商，轻人文的，于是，在〈读中文系的小子〉一文中，他情不自禁地两次发出“读中文系难道一定得和钱途挂钩？”<sup>30</sup> 这样的诘问。他在〈传灯〉（1989）这样写道：

在这里读过一点中文的人都清楚，似乎是读越高的中文，就须要有越大的勇气：要顾及出路，要顾及不会忽略国语和英语，要顾及自己的文化情怀不会参杂有任何的政治意识。要想到许多文人徘徊在文化良知和现实之间那份复杂的心情，心里就不能释怀，更觉得这条路分外难行。<sup>31</sup>

题名“传灯”，既呼应传统意义上薪火相传的文化使命，也暗示了作者“燃灯自照”的精神需求。对“中文系的小子”而言，所肩负的也许不仅是华社的期待，更是对于自身独立精神的勇敢持守。这样一种微妙的学术之路，将读者引向了作者内心的矛盾：要坚守学术文化传灯，却又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要完成时代赋予的责任，却又陷于知识分子孤独的精神困境。因此，他在〈校园书〉（1989）中坦承自己走人文道路走得“很累”，所以“这些年来我从来不曾刻意也不敢影响别人走我同样的路……”<sup>32</sup> 尽管如此，他依然坚守〈只缘身在此山中〉（1989）的信念：

我是属于中文系的，我告诉自己。这几年里，我学到中学课堂里阙如的古典和生命，追溯几千年来人类的思维。不过我真正珍惜的，却是从中领略到的一种关怀、一种爱、一种活力、一种良知，我默默地思索生命的意义。<sup>33</sup>

从坚守中体悟出对文化、生命的关怀与热爱，这是修读人文科系者的一种精神担当。可见，“感物吟志”之中所蕴含的，正是何国忠个人志业与情怀交织而成的忧患——既有对自身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也有对人文精神难以伸张的感喟。

随着学识历练的增长，何国忠的散文笔触逐渐变得更加沉稳内省。比起《班荇谷灯影》时期“这个年龄充斥的是以天下为己任”<sup>34</sup> 的直诉忧患、不平则鸣，《塔里塔外》（1995）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从更成熟、冷静的学院派，表达自己对学术的执着与身为学者的自省。《塔里塔外》是一部“脱离了校园主题，跨足到文化现象批评层面的学院散文”。彼时已是马

<sup>29</sup> 同上

<sup>30</sup> 同上

<sup>31</sup> 何国忠：〈传灯〉，《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23-125。

<sup>32</sup> 何国忠：〈校园书〉，《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74-176。

<sup>33</sup> 何国忠：〈只缘身在此山中〉，《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43-49。

<sup>34</sup> 何国忠：〈苦涩的岁月〉，《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62-64。

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的何国忠，将其忧患视野从象牙塔内扩展到社会文化现象，并以“感物吟志，随性而写”的笔调，探讨如何在校园与社会之间寻求自我定位。〈动与静〉（1995）便清晰呈现这种心境：

九个月内连续参与筹办两个活动，在学者‘应该甘于寂寞，应多研究写作’的理念上，的确让我觉得不安心，担心误了正业。但在感性上，偶尔的筹办活动应是我生命中自然的过程，也许是身体中就存在着一些动的基因，又或者是现实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刺激。<sup>35</sup>

在文中，他坦承学者“应多研究写作”的理性要求与现实环境对其文化责任的呼唤之间的紧张：他想潜心治学，却也无法完全排拒社会与文化事务。借用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诗意自勉，何国忠努力于“虚静治学”与“现实介入”之间探寻平衡，并期望“无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寻找定位”的理想能够实现。《文化人的感情世界》收录了他担任马大东亚系主任期间发表的“怀人散文”，其中的〈郑良树老师的心事〉（2002）一文他也有同样的自省：“我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建树，动的时间太多，静的时间太少，不够用功，实在愧对老师。”<sup>36</sup>再次点出学术理想与现实事务冲突下的内在矛盾。

在“感物吟志”的维度，何国忠笔下聚焦的不再是族群或社会体制的不公，而是人文价值可能被忽略的忧思。他多次提及中文系的人文学术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张力，认为一旦放弃人文关怀，整个民族将面临深层次的文化贫乏。由此，他的忧患意识自然与传统文人“士不可不弘毅”之气质相贯通，也与当代知识分子讲求的科学理性和独立思考相结合。何国忠的散文，尤其在〈读中文系的小子〉与〈传灯〉这类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于“为何而学”、“为何而写”的追问。作为理想主义者，他心中有对社会与文化的无限期待；作为现实中的学者，他又深知环境之局限和个人之渺小。两种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张力，正是“感物吟志”的精彩之处。何国忠的“感物吟志”始终与“感时忧国”形成辩证互文：前者深化了后者的思想厚度，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现实支点。当族群命运的集体焦虑与个体精神困境交织，这种内外并存的忧患正是其散文从社会介入到人文反思的关键路径。何国忠的忧患意识逐渐从“华社之天下”拓展至“人文之天下”，最终完成了对传统“先天下之忧”的现代重构——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在于直面现实苦难，更需在文化传承与人性关怀中寻找终极价值。

### （三）人间情怀：文化超越的终极关怀

校园散文三部曲，尤其是《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展现了何国忠忧患意识从传统的“感时忧

<sup>35</sup> 何国忠：〈动与静〉，《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85-93。

<sup>36</sup> 何国忠：〈郑良树老师的心事〉，《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143-148。

国”与“感物吟志”向更深层次的“人间情怀”演进的过程。这一演进并非对前两者的割裂，而是以文化共情为纽带，将族群命运与个体困境融入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视野。

关于何国忠散文的忧患意识内涵的讨论，钟怡雯(2009)的“马华文学的‘浪漫’传统”论述最受关注。她以“纵的上承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横的切出时代脉动，进而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sup>37</sup>来对校园散文进行概括。钟怡雯认为，何国忠看似“反浪漫”的“浪漫”书写，是一种隐藏于淡定文字之下的“文化托命”与理想焦虑。钟怡雯进一步指出，何国忠在作品中不书写“经国济世”之宏志，而着重“感情”与内心刻画，可能是一种对比个人心境而进行的自我投射——作为一个文人，对社会改革的无能为力，或用以掩饰自己在政治社会中的无能为力。<sup>38</sup>这一解读，可能错估了何国忠的创作意图。若更深入检视何国忠的文本，便会发现，他所关注的并不只是“政治社会中的有力或无力”，而是以学者姿态去挖掘文化人心灵深处的价值。何国忠并非以“淡定”掩饰无力感，而是以更宽广的人文与理性视域，探寻学者在现实政治之外的精神使命。他将对社会改革的关注转化为对文化精神的深度凝望，并非掩饰或退避，而是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使命的积极尝试。他的文字不写“经国济世”的表面雄心，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介入；恰恰是通过剖析文化人的灵魂与境遇，何国忠向读者展现了理性与人性交融的“人间情怀”，超越了狭隘的族群叙事。

中国当代学人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1993)中提出：“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他主张：“学者如果选择‘议政’，是基于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是一种‘人间情怀’”。陈平原强调，学者在社会生活中应保持“人间情怀”，即在专业研究之外，凭良知与道德对现实进行关注与反思。<sup>39</sup>何国忠的散文创作正契合这一学者姿态，其忧患意识并非局限于钟怡雯所言的政治无力感，而是以感性与理性交融的方式，展现出对人性本质与文化遗产的深刻省察。何国忠在其写作初期便明确分工，他在《塔里塔外·后记》(1995)中提到，这阶段的写作分为三类：一类是安身立命的学术论文；一类是专栏的评论文字；还有一类是用以调节心情的散文创作。学术论文发挥其专业特长，评论文字针砭时弊体现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散文创作则成为他保持“人间情怀”的载体。博士毕业后从英国回到马来西亚，何国忠以治学为主，报刊邀其撰写时事与文化评论，他选择以学者散文的形式，通过随笔与闲聊的方式怀人抒怀，表达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他虽企盼名士风韵，却往往因“有情”与“不忍”，无法做到“难得糊涂”，因而在散文中“入世痕迹处处”<sup>40</sup>。陈蝶(1991)认为“何国忠如果在其政治性和知性强烈的文字中注入更多‘感性’，不失为九十年代的星光。”<sup>41</sup>事实上，何国忠却恰恰是个极为感

<sup>37</sup> 钟怡雯：〈马华校园散文的文学史意义〉，《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149-174。

<sup>38</sup> 同上

<sup>39</sup>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05)，75-80。

<sup>40</sup> 何国忠：〈后记〉，《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173。

<sup>41</sup> 陈蝶：〈细雨狂飙含笑过——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七十年〉，收入戴小华，柯金德编《马华文学七十年：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1年，页177。

性的人，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充沛”<sup>42</sup>与“多情的细胞”<sup>43</sup>。他在〈感性与理性之间〉(1995)提到学术使他摆脱少年的彷徨，因专注写论文，他的感性越来越少，但不引以为憾。不过，他接着又说“没有感情写不出好文章，学术和非学术文章都是如此，才识重要，学问重要，但也要有感情，读来才有味道。”<sup>44</sup>他在〈书事〉(1995)中表达了对“情见乎词”的散文小品的喜爱，不喜“满纸说教，喜欢言志，卖弄道德嘴脸”的文字，因为“没什么‘人’味”<sup>45</sup>——重“情”重“人”，从中不难窥见其“人间情怀”。这种“人间情怀”表现正是知识分子（尤以专业的人文学者）坚持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政治和文化做出的关照。

由于很早便以人文学者为志，何国忠的“人间情怀”亦体现为对学术使命的自觉承担。散文创作是他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旨在以“跳脱的笔法”<sup>46</sup>传递学者的文化反思。这种“跳脱”并非疏离现实，而是以更自由的姿态介入人文议题。何国忠校园散文很早就从人文精神角度去审视马来西亚华社与文化的困境，如在《斑苔谷灯影》的〈人文鼓钟〉(1995)一文中，何国忠从陈寅恪(1890-1969)和徐志摩(1897-1931)取向高远的学术精神出发，指出“我们的文化还在某一个层次里滞留不前”，呼吁“文化探讨的工作不应该永远停留在启蒙或概论式的阶段”<sup>47</sup>。这种思考体现了他对文化发展前景的忧思，与其胡适思想研究一脉相承，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关怀。何国忠的忧患意识不可否认继承自五四知识分子传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如鲁迅(1881-1936)、陈独秀(1879-1942)等人，以批判传统、救国救民为己任，忧患意识多集中于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何国忠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他同时也受到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于是在散文创作中自觉地寻求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流露其学者的“人间情怀”。如前所述，何国忠最是重人重情，因此其散文大多写人，而他又最重视人物的性情，他常通过人物性情去思考、探索和剖析文化和历史，表现其对民族群体文化命运的深刻忧思，流露对人的真挚关怀。胡适、周作人(1885-1967)、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等五四文人，余时英(1930-2021)、柳存仁(1917-2009)等当代文人，马来西亚文化人族魂林连玉(1901-1985)，其师长郑良树(1940-2016)、林水椽(1942-)，还有时常与其交往的张景云(1940-)、赖瑞和(1953-2022)、祝家华(1962-)、何启良(1954-)等人皆反复出现在散文中，可见都是时常徘徊在其心中的人物。其中，最能凸显何国忠人间情怀的便是他以闲聊式随笔所写的“怀人散文”，尤其是30篇写马来西亚及中外文化界人物的《文化人的感情世界》。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以中国及马来西亚华裔文化人为主要叙述对象，亦包含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萨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等中马以外的文化人。与一般人物传记聚焦学术功业不同，

<sup>42</sup> 何国忠：〈十方版自序〉，《斑苔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5。

<sup>43</sup> 何国忠：〈只有一叶虫蛀的桔黄〉，《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155。

<sup>44</sup> 何国忠：〈理性与感性之间〉，《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38-45。

<sup>45</sup> 何国忠：〈书事〉，《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60-66。

<sup>46</sup> 郑明姍：〈论何国忠散文〉，《香港文学》，2016年3月，第375期。

<sup>47</sup> 何国忠：〈人文鼓钟〉，《斑苔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68-170。

此书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性情、精神、趣味。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写 9 位杰出的马来西亚华裔，足见何国忠对树立华社风范之重视，郑明娟认为他是在为所敬佩的马华文化人立传。书中对跨域文化人命运的书写，既关注对林连玉、郑良树等马华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也涵盖对中西文化碰撞下人性矛盾的思辨。〈被遗忘的医生〉（2002）〈那个槟城人〉（2002）〈终识父语〉（2002）分别叙述了伍连德（1879-1960）、辜鸿铭（1857-1928）和林文庆（1869-1957）三位晚清民初新马出生，与中国有着特别渊源的读书人。三位皆为留学英国的英校生，早年不谙中文。相较于卷入政治洪流的辜鸿铭和林文庆，出生于槟城的伍连德选择置身事外，〈被遗忘的医生〉文中写道：“1954 年东姑阿都拉曼和陈祯禄到怡保劝他从政，伍连德的拒绝理由极为有趣：‘政治会太伤脑筋的’”<sup>48</sup>伍连德是医生，医学救国一贯始终，对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医学界都有重要的贡献，英国《泰晤士报》称：他的死对医学界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传奇性的英雄人物。<sup>49</sup>〈被遗忘的医生〉描述了伍连德的坚守医学岗位却淡泊政治，最后这样写道：“怡保和槟城虽然各有一条路以其命名，但许多人或者像我一样，走过而不知道。”<sup>50</sup>文章戛然而止，平淡却余味深长，既致敬伍连德的贡献，又揭示其被遗忘的命运，蕴含对文化记忆消逝的深切忧思。辜鸿铭常被描绘为“怪”“狂”与中华文化狂热者，何国忠跳脱了对辜鸿铭的刻板印象，深入剖析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复杂性，他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富有浪漫气息的人物，他性格偏激，文字犀利。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盛行，辜鸿铭在中西文化的争论中，被推到极端，成了一个只会高举传统旗帜的怪物。”<sup>51</sup>他以理解而非批判的眼光，刻画辜鸿铭的浪漫与偏激，揭示了对文化人精神困境的共情。在〈那个槟城人〉以辜鸿铭“偏激崇古”的性情，揭示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近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让人有错位的感觉，五四时代反传统的健将陈独秀和吴虞，  
都没有去过西方，但对中华文化却有强烈的排斥，辜鸿铭精通西学却又对中华文化  
怀着极端崇敬的态度。<sup>52</sup>

通过辜鸿铭的“错位”形象，何国忠揭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普遍困境。在〈终识父语〉中，何国忠探讨了林文庆从不谙中文到“降服中华文化”的心路历程。他对比林文庆与鲁迅等人，指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不能简单地概括，鲁迅反传统，谁都知道他的国学根基是林文  
庆望尘莫及的，但就西方文化的领会，鲁迅当然远远不及林文庆。这种现象有趣也

<sup>48</sup> 何国忠：〈被遗忘的医生〉，《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页 125-130。

<sup>49</sup> 同上

<sup>50</sup> 同上

<sup>51</sup> 何国忠：〈那个槟城人〉，《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页 131-136。

<sup>52</sup> 同上

好玩，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矛盾，许多讨厌中华文化的人，国学基础深厚得可怕，鲁迅和钱玄同都是例子，而拥护中华文化的人，又常常都是那些英文根底极强的人，林文庆以及“学衡”君子如梅光迪和吴宓都是。<sup>53</sup>

这种“错位”现象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认同中的矛盾与挣扎，而何国忠对矛盾的包容，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叙事，展现了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共情。辜鸿铭和林文庆都是因机遇“降服中华文化，破开零的局限，苦学中文”<sup>54</sup>，而伍连德则保持疏离。何国忠以平实叙述与含蓄情志，捕捉了这三位文化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的故事，反思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体现了对个体命运的深层关怀。这种不加评判、理解与共情的笔调，揭示了文化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超越了族群叙事的局限。

《文化人的感情世界》里所述的文人，大多带有悲剧色彩。他们的悲剧人格和悲剧命运共同构成了何国忠对文化人宿命的终极思考：他们的悲剧性并非个体的偶然，而是文明冲突中人文精神困境的缩影。作为学者型作家，何国忠的学院派散文与其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他在《文化人的感情世界·自序》云：“对一个文化人来说，对自身及群体的反省，是毕生事业中一部分无形的负担……本书为作者最近之人物研究与人文观察之凝聚。”<sup>55</sup>《文化人的感情世界》的创作期间，何国忠正与林水豪、何启良编撰着《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因此得以深入理解马来西亚的文化人物。他融史料、知识和思辨为一体，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表达对人生际遇和历史文化的理解与反思，并通过《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对跨域文化人命运的书写，将个体苦闷升华为对人类精神困境的共情。故何国忠不写文化人的经国大业而聚焦感情世界，笔者以为并非如钟怡雯所说的“无法改变现实，‘反求诸己’的抵抗或回应”<sup>56</sup>，而是通过“人”的微观叙事，叩问文明存续的宏观命题，以文化共情超越“感时忧国”的局限。由此可见，“人间情怀”才是何国忠更深重的忧患内涵，亦构成其散文终将走向文化超越的基石。

这份“人间情怀”更进一步表现在对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忧患意识。除了自觉承担历史文化的反思，何国忠在校园散文三部曲的部分篇章里，也透过对自然、环境和人生价值的探讨，折射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层关切。虽然涉及对生态问题或文明演进的篇幅不多，却也显现了其视野早已超越本土与族群边界，进入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宏大话题。在《直观心情》(1995)中，他从知识分子视角谈环保：

环境保护当然是一个大课题。我是门外汉，一切观感都是从“看了开心”，“感觉

<sup>53</sup> 何国忠：〈终识父语〉，《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137-142。

<sup>54</sup> 同上

<sup>55</sup> 何国忠：〈自序〉，《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sup>56</sup> 钟怡雯：〈“浪漫”传统〉，《永夏之雨：马华散文史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7年，页147。

舒服”角度出发，局限在单纯的直观里，不敢说庄严一面的理念。现代人身在城中，心在城中，不能只顾自己，虽然不容易保存层次太高的文化品位，也不能太在意幽古情怀和文化艺术，那会使自己陷入死胡同；但总难免希望政府在美感和发展中注意一下两全其美的方法。<sup>57</sup>

城市的发展带来生态问题，也对人文与文化空间带来忧患，何国忠不是环保分子，他没有高谈环保，而是以人文视角表达对城市发展能兼顾文化与美感的期望。文中也论及其所在的马大因发展需要大肆砍伐树木、破坏校园的自然景观，导致曾作为“文艺男女灵感泉源”的马大湖一度干涸，校园失去原有的风情。这一场景的凋零，实为文化空间萎缩的缩影。于是他借题发挥，从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重构大学的人文图景：

大学应该绿意盎然，并且每时每刻绿意盎然。有草原、有小涧、有山丘、有树林、有湖泊，据说以前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湖，学生闷闷不乐，后来有一位校友捐了一笔钱，挖了一个大湖，于是普林斯顿的学生也可以像哈佛、剑桥、耶鲁、康奈尔一样划船，大家才展露欢颜。那才像校园，校园应如陈之藩在《失根的兰花》所提到‘美的像首诗，也像幅画，依山起伏，古树成荫’才是，如此人才会有幻想力，才能写一些真真假假的妙文。像剑桥的徐志摩，海德堡的金耀基（1935-），还有中大的余光中（1928-2017）。<sup>58</sup>

借“绿意盎然的大学”意象，作者将环保议题隐喻为人文精神的存续之忧，标志着其忧患意识从族群命运向人类文明层面的拓展。

“人间情怀”最终指向了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这一追问既是对存在本质的哲学思辨，亦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使命的伦理回应。身为敏感而多情的知识分子，在〈年少纪事〉（1995）一文中，何国忠以近乎存在主义的笔触袒露困惑：

我在寻找人生意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阳光底下无新鲜事，若人生真是舞台，我们在人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被扮演几千几万次了。但我们始终无法演得好。为什么？我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虽然觉得生命很无奈，也很空虚，但若有人要我放弃生命，又觉得不甘心，也许是真的习惯爱了，但爱又是

---

<sup>57</sup> 何国忠：〈直观心情〉，《塔里塔外》，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53-59。

<sup>58</sup> 同上

什么？<sup>59</sup>

此处的“舞台”隐喻，既呼应加缪“人生如戏”的荒诞性，又暗合传统文人对生命短暂与历史循环的喟叹。然而，他并未沉溺于虚无，而是以白先勇（1937-）《蓦然回首》中“七情六欲煎熬的苦难”为启示，顿悟“人的悲剧是必然的。”<sup>60</sup> 这种悲剧意识并不等同于消极认命，而是以“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为支点，将个体彷徨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困境的共情。在《花开花落》（2002）中，他也通过伍尔芙的悲剧，探讨生命意义与精神自由的永恒困局，最后以“我们步步追寻她的死因，觉察到的却是人生的无言以对”<sup>61</sup> 做结，冷峻笔调下暗涌着对精神困境的深切体察，这种“冷笔热肠”的叙述策略，恰是学者理性与文人感性的交融：一方面以学术眼光剖析悲剧根源，另一方面以文学笔法守护人性的温度，在节制中凸显忧患的深沉。何国忠分别在《感性和理性之间》（1995）和《人间今夜浑如梦》（2002）写到王国维之死，他认为“王国维就是想得太深沉，所以注意到许多别人观察不到的事物，但也由于他的敏锐，结果许多事情让他无以释怀”<sup>62</sup>。对于王国维“深思熟虑的自沉”<sup>63</sup>，在《人间今夜浑如梦》他写道：“就王国维的精神取向来说，我们只能尊重，若有人因他放弃人生而以愚笨称之，我们只能说生命之事岂能一言道尽，谁敢狂妄地说比王国维想得更深微？”<sup>64</sup> 这种对文化人精神选择的尊重与共情，正是“先天下之忧”传统在当代的延续：从范仲淹“忧其民”到何国忠“忧其人”，对人性价值的坚守始终未变，但关怀视野由家国延伸至全人类。如此对生命本质矛盾的剖析，既继承了儒家“士人”的责任伦理，又结合现代对个体生存的反思，使得“忧患”不再局限于族群命运或政治现实，而是触及自由与限制、理想与幻灭、意义与虚无等多重张力。通过散文创作，何国忠将王国维的“文化托命”、伍尔芙的“精神自由”、白先勇的“悲悯之心”编织成一张跨越时空的意义之网，让这种忧思在多重文化的交汇中绵延，回响于对生命本质的深沉追问之中。

随着写作的不断推进，“人间情怀”意涵超越了“感时忧国”传统框架，散文的聚焦点从族群危机延伸至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身处人文专业之学者身份，何国忠通过文化共情与理性思考，将忧虑融入对人性、历史与文明的省思，既延续了对华社前途的关注，又拓展至对更宏阔的普世价值的守护。从《班荇谷灯影》到《塔里塔外》，再到《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作品忧患视域的逐渐扩大，见证了作者从“大学生—社会观察者”到“学术型散文家—理想坚守者”再到“人文学者—人间情怀守护者”的成长历程。由此，何国忠的关注焦点不再局限于地域或当下，而是投向人类文明的未来与可能。

“感时忧国”“感物吟志”到“人间情怀”三重忧患维度，构成了何国忠思想的深层结构。他未停留于社会运动或族群抗争的层面，而是在跨文化与学术视野中探寻长远的精神支持

---

<sup>59</sup> 何国忠：《年少纪事》，《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67-84。

<sup>60</sup> 同上

<sup>61</sup> 何国忠：《花开花落》，《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113-118。

<sup>62</sup> 何国忠：《感性与感性之间》，《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38-45。

<sup>63</sup> 同上

<sup>64</sup> 何国忠：《人间今夜浑如梦》，《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61-66。

与文化启迪。钟怡雯将之视为“反浪漫的浪漫”，虽有启示性，却未必全面。对他而言，“淡定”与“情感”书写更可能是拓展社会意义与人文价值的另一路径：透过学术与散文的互文方式，将忧患传统置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加以诠释与实践，从而通往对终极关怀的超越与召唤。因此，何国忠的“人间情怀”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改革的退却或无奈，而是知识分子自觉超越族群、面向普遍人性的选择。他在散文中逐步展现出既立足本土又胸怀世界的文化格局，也为“学院派散文”中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更博大的内涵。此种从“社会”到“文化”，再到“人性”的跨越，呼应“先天下之忧”深厚的文人传统，也彰显了当代华裔知识分子理性思辨与人文情怀相互交融的写作风采，使其作品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语境之外，也能折射深远的人文意味。

### 三、叙述风格的理性克制：知识分子性格的文本投射

#### （一）不渲不染的忧患叙述

何国忠的忧患书写始终是以理性克制为底色。在同时期校园散文中，他的笔调显得格外冷静，这样的叙述风格恰是其知识分子性格中理性与克制的文本投射。潘碧华（2004）的〈80年代校园散文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将校园散文的“忧患意识”概括为“忧虑、孤愤、沉痛、压抑性的情绪”<sup>65</sup>。何国忠的散文虽同样流露出对华社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忧虑，不过他将“感伤特质”拿捏得恰到好处，鲜有如温任平或潘碧华所称的“孤愤之情”。面对不公政策或堪忧处境，何国忠尽管心有沉痛幽愤，却始终保持平实、冷静的笔调。他在《塔里塔外·后记》（1995）中写道：“我始终清楚，大欢和大痛都是人间微不足道的涟漪……在自己书写的过程中，耳边常会响起大文人、大学者的声音，因此下笔用字多了一层犹豫。”<sup>66</sup>这种“犹豫”并非怯懦，而是学者自觉与历史纵深的体现：与其让“欢痛”席卷理智，毋宁回归学术主体，透过对历史与现实的纵深观察，冷静地表达对华社与人类命运的关怀。因此，他有意避免情绪化宣泄，转而通过文化的内省与理性的剖析表达忧患，将深沉忧思融入平淡自然的叙述中。

他这样的写作格调是有迹可循的。在〈万里长风〉（1995），何国忠说胡适“下笔稳重，既不惨兮兮，也不飘飘然，唯文化良心和社会公道是问，替中国现代化提出许多到今天还值得深思的问题……胡适一向理智而冷静。理智的人心都会细，事事都考虑到前因后果；冷静的人眼睛都会敏锐，看事情自然比较清楚。”<sup>67</sup>他借胡适“理智而冷静”的笔风，强调知识分子需以长远眼光审视现实：“胡适没有沉痛的悲哀，没有狂热的情绪。因为他的看的是长远的中国。”<sup>68</sup>何国忠的叙述策略也深受周作人的“冲淡”文风影响。他在〈苦雨斋将不知是什么样儿了〉（2002）中评价周作人：“周作人的文章未尝不骂世，未尝不暴露黑暗，未尝没有一种微涩的苦味，但他

<sup>65</sup> 潘碧华：〈八〇年代校园散文所呈现的忧患意识〉，收入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页292-304。

<sup>66</sup> 何国忠：〈后记〉，《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91-193。

<sup>67</sup> 何国忠：〈万里长风〉，《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43-146。

<sup>68</sup> 同上

写的东西较多含蓄，在乱世和无端的社会中，一直都表现一种平淡、祥和和恳切的风采，关键所在，点播两下严肃的意见，悠然一见南山就止住，这也就是他文章耐看的缘故。”<sup>69</sup> 他显然推崇这种“含蓄、平淡、祥和”的风格，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写作特质。故而，无论抒写的主题、谈论的课题多么沉重，何国忠的散文始终保持平淡自然的行文，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感情基调，“不徐不急”的叙述节奏（陈大为语）<sup>70</sup>，这大约就是他有意经营的写作风格。

在《班荇谷灯影·后记》何国忠写道：“我不太相信灵感。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体上都和阅读、观察、思索有关。”<sup>71</sup> 阅读、观察之所得，经过思索后，心中即使再愤慨，经作者用心经营后衍化而成的文字已不是宣泄似的倾诉或控诉，不再是情绪书写，而是化成了何国忠式“不渲不染”的忧患叙述。所谓“不渲不染”，并非一味抹平情感，而是将忧思化为更深沉的理性审视，将现实压力转化为思辨张力，凸显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特质。

## （二）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调和

贯穿于何国忠的散文之中的，除了“不渲不染”的忧患叙述策略，还有他自身“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双重身份之间的动态调和。作为一位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的华裔知识分子，他既承继了中华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又在现代学术体制里接受了理性思辨的训练。这种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张力，既影响了他的散文书写，也形塑出其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格。

作为“学院派散文”的代表，若溯及何国忠散文的内在精神源头，则可发现他延续了古典文人的担当意识。曾维龙以“从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寻找对应之道的传统知识分子”<sup>72</sup> 称之，而他亦以文人自诩。“先天下之忧”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传统文人最核心的精神信念，不仅代表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也是一种道德自觉。何国忠青年时期在校内外组织华文学会等活动，屡屡表现出此种文人担当；他在早期作品中如〈残存记忆中的腾跃〉（1995）〈时代的眼睛〉（1995）常聚焦对华社生存处境的关注。相较于单纯的“争取权益”，他倾向从文化理想与文明延续的角度来加以诠释，这无疑展现了传统文人对民族文化的深切情怀。然而，他未止步于“士大夫”式的激情。他在高等学府里所接受的现代学术训练，使他对社会、历史与文学有了更为理性、批判的眼光。他在散文书写中，时常通过文献考据或跨文化比对等方式展开论述，如在谈及伍连德、辜鸿铭以及马来西亚华社境况时，常呈现出史料佐证与理论思辨的痕迹。这种学术底蕴使得他的散文不流于滥情或单一抒发，也推动其从“浪漫式”悲情走向冷静、自觉的深层批判。例如，《文化人的感情世界》虽表面是怀人散文，却借实地资料与历史背景剖析这些文化人物在

<sup>69</sup> 何国忠：〈苦雨斋将不知是什么样儿了〉，《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页83-88。

<sup>70</sup> 陈大为：〈校园散文的生产语境及其谱系之完成（1979-1994）〉，《马华散文史纵论（1957-2007）》，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185-222

<sup>71</sup> 何国忠：〈后记〉，《班荇谷灯影》，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页174-178。

<sup>72</sup> 曾维龙：〈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政论写作〉，《批判与寻路：90年代马来西亚华社评论写作》，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年，页45-72。

政治、社会与学术的交汇处所承担的使命，赋予作品更多“学院派”深度。

钟怡雯认为何国忠不书写“经国大志”而偏向书写情感世界，或许是“对社会改革无力的掩饰”<sup>73</sup>。但若从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精神融合的视角切入，则可发现：这其实是何国忠基于学术立场与文人情怀的“迂回介入”，并不意味对政治社会的妥协或失语。传统文人常以曲笔述历史兴衰、社会时弊；现代学者亦可藉由研究成果与平实叙述来践行文化使命。何国忠正是在“学院派散文”的书写中糅合了两者，把“家国忧思”转化为更具理性与学理性的文化关照。看似淡定的文字，其实隐藏着的是深沉的批判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他不选择煽情或直接对抗，并非“无能为力”，而是知识分子对复杂现实的一种冷静因应。与此同时，这种理性克制的叙述策略也使作品更具延续性：并非借一时激昂打动人心，而是在温和沉潜之中彰显了文人的宏阔视野。在面对族群困境与全球化挑战之际，这种兼具“文人之心”与“学者之思”的创作风格，不断呼应何国忠对华社前途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忧思。

散文中体现的“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调和”，正是何国忠忧患意识在身份层面上的最佳写照：既有对家国文化的深切情怀，也具备学术理性的敏锐分析；既延续文人“入世”的担当精神，又在对改革思考中保有学者的冷静与“出世”的气质。正因如此，他的文字不局限于单纯“论政”或“诉苦”，而在一种更宽阔、更纵深的叙述空间里，将深沉的忧患融汇于学院派散文的语言美学与理性沉思之中。他的散文折射了华裔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时代与文化交错处境，并在不喧哗的姿态里，稳固而持续地推动着对华社、对学术、对人文精神的多重关怀。从这点上看，何国忠既是一个深受传统文人影响的“士”，亦是融入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两者并不互斥，而是在他的写作与人生道路上不断调和，最终呈现为其“学院派散文”的核心风格与精神内涵。

### 结 语：先天下之忧的现代回响——何国忠的忧患意识书写

在大学时代出版校园散文集《班荇谷灯影》以后，何国忠便被马华文学界寄以厚望，被喻为“90年代的星光”。他也不负众望，以其“学院派散文”在80-90年代马华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他不仅以“校园三部曲”奠定了学院派校园散文的基础，更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为精神内核，提升了这一体裁的思想高度与人文深度。关于80-90年代马华校园散文的忧患意识内涵，学者与评论者普遍将焦点落在“感时忧国”或“感时忧族”<sup>74</sup>，毕竟“华社忧患”是马哈迪时代的抒情主调。然而，何国忠的校园写作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21世纪初，不仅贯穿了学院派校园散文的开启与成熟，其创作跨度之长、视野之广，也远远超过一些早夭的校园写手。伴随何国忠从青年学子到人文学者的身份转变，他的“忧患心理”亦随之演变，因而无法以单纯的“感时忧国”来加以概括。

<sup>73</sup> 钟怡雯：〈“浪漫”传统〉，《永夏之雨：马华散文史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7年，页129-148。

<sup>74</sup> 黄锦树：〈在马哈迪时代抒情〉，《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页133。

作为早年立志，后来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何国忠的散文不若与其同时期的马华学者作家如祝家华的孤愤（1963-）、辛吟松（1963-）的悲怆，其学院派校园散文中所展现的忧患内涵，也并不完全如部分研究者所说那般：因政治上的无力感而将“文化托命”付诸宣泄性文字。从《班荇谷灯影》到《塔里塔外》，再到《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其忧患书写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从“感时忧国”的现实介入、“感物吟志”的个体省思，最终升华为“人间情怀”的文化超越。这三重维度并非线性更替，而是如螺旋般交织共生，既延续了传统的士人精神，又在当代华裔知识分子的实践中开拓出新的思想疆域。何国忠散文的独特魅力不仅在于忧患意识的多维内涵，还体现在其理性克制的叙述风格。这种“不渲不染”的笔调，既是传统文人沉郁情怀的继承，又融入了现代学者的理性思辨。他避免情绪化宣泄，将深沉忧思融入平实冷静的叙述，使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这种风格不仅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文本投射，也为学院派散文注入了独特的理性光辉，提升了其审美层次。

何国忠的“学院派散文”以忧患意识为灵魂，以理性克制为形式，深刻体现了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见证了一个知识分子从时代观察者到人文守护者的思想成长史。本文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对何国忠“家国忧思”的单一解读，揭示其忧患意识从对族群命运的关注扩展至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演进轨迹。通过对其思想历程的历时性重构，本文论证了何国忠如何在当代马华语境下践行“先天下之忧”：不仅关注华社现实，更在文化遗产与人性关怀中探寻终极价值。这种多维视角凸显了他的学院派散文超越地域与族群界限的文化格局，成为马华文学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也为当代华文文学的学理性探索与人文精神实践，提供了生动而深刻的范例。

## 参考文献：

### 文集

1. 何国忠：《班荇谷灯影》初版，吉隆坡：泽吟书坊，1989年。
2. 何国忠：《班荇谷灯影》十方版，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
3. 何国忠：《塔里塔外》，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5年。
4. 何国忠：《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吉隆坡：嘉阳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论文集

1. 钟怡雯：《永夏之雨：马华散文史研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2017年。
2. 钟怡雯：《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3. 钟怡雯：《灵魂的经纬度：马华散文的玉林和心灵图景》，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年。
4. 陈大为：《马华散文史纵论（1975-2007）》，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
5. 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编：《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6. 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散文史读本》Vol. 1-3，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7. 曾维龙：《批判与寻路：90年代马来西亚华社评论写作》，雪兰莪：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年。
8.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研出版社，2002年。
9. 何国忠：《今我来思》，吉隆坡：十方出版社，1993。
10.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

### 期刊论文

1. 郑明娴：〈论何国忠散文〉，《香港文学》，2016年3月，第375期。
2. 潘碧华：〈八〇年代校园散文所呈现的忧患意识〉，见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主编《赤道回声》，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3.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1年，（1）。
4. 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05）。
5. 陈蝶：〈细雨狂飙含笑过——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七十年〉，见戴小华，柯金德编《马华文学七十年回顾与前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1991年。